

高教育政策之基礎

張建邦譯



驚聲文學作品供應公司

S

019295

G 640
884

高等教育政策之基礎

譯 邦建張 19庫文聲驚



S9000194

高教育政策之基礎

驚聲文庫 19

譯著者：張姜
發行人：行人
出版者：版者
臺北市永康街二十號之一
電話三三七六一號四六七〇
郵購帳號一三文印書館
印刷者：刷印者
臺北市柳州街168號之5
電話三六一四〇
特價：平裝新臺幣六十元
精裝新臺幣十二五元
初版：中華民國年五月月

內版業臺字第3341號 註記登部政證
勿翻印

譯者序

從「知識的爆發」、「大學的功能」、以至「大學的嬗變」，我們對目前高等教育問題，作了較有系統的若干譯介。三書發行以來，知識界與教育界的先進頻頻賜予關注，使我們獲致無限鼓舞！對高等教育的諸多問題，為求進一步的探根溯源，爰再選譯「高等教育政策之基礎」一書，其內容包括：「高等教育為誰設立」、「通才教育」、「專門教育」、「有關倫理的幾個問題」、「更深入的政策基礎」五章，此書論列高等教育政策之制定，頗具精審縝密的剖析。

由於知識之大量擴增突飛猛進，舊的教育方法與講授題材，多已落伍不能適用亟待革

新。教育政策，自然尤須重新釐訂，譬如：高等教育之門，往昔僅爲少數特殊人物而設。而今由於知識爆發，社會對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國民教育雖已延爲九年，但漸見仍不足以使全民知識水準提高到合於時代需要的程度，勢須早日再加延長更多的年限，方能肆應。而大學之門，遲早將亦演變而爲人人所敞開。美國前總統詹森在一九六四年表示：「因爲科學與技術的突飛猛進，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奢侈，而是必需。」美國一所員生最多的大學校長亦說：「新的知識是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最重要的因素，這是世人普遍認識的一點，尤其是大學應該認清的基本事實」。

在世人的心目之中，在過去幾達千年的歲月，大學，它是追求真理的碩彥鴻儒所組成的獨立社會，歐洲方面的大學尤其如此。但是到了一九六〇年之後，代之而興起的觀念，是：大學已成爲一種「國有工業」，逐漸被視爲知識工業的神經中樞，致力於國家的富強與威望之提高。

教育家杜威曾說：哲學是教育的基礎根源，教育是哲學的實施證驗。於斯可見教育與哲學關係之切密，亦即是說：教育的實施，依據於哲學之理論；哲學的價值，則顯於教育之實

施。

從歷史上看，各時代的教育概況，往往視各時代的哲學思潮而轉變：希臘時代有蘇格拉底、柏拉圖等崇尚理想、尊重知識的哲學，於是乃有文雅的教育；羅馬時代有西塞羅、遜內卡等崇尚辯解、尊重事功的哲學，於是乃有實用主義的教育；十六世紀以後，牛頓、培根等人輩出，隨之而有尊重科學知識的教育；十八世紀有盧梭、赫爾巴特等人的個人主義哲學，遂演成注重個人人格發展的教育；十九世紀有斐布德、斐葉等人倡導民族主義的哲學，因而產生着意於公民訓練的教育；二十世紀之初有杜威等倡導民主與實用主義的哲學，於是而有教育機會均等的呼聲。

人類能以智慧創造自己，創造環境，建立制度，制定政策；同時，人類的環境、制度、與政策，實則也有薰陶自己、孕育自己的作用，相互循環推演，生生不息，這寧非人類文明拓展之所繫？現在，譯者謹再提供這一本「高等教育政策之基礎」，獻與學界先進、教育人士，或可作為學術上探討的參考。

高等教育政策之基礎

John S. Brubacher 著
張建邦譯

目錄

譯者序	一
第一章 高等教育爲誰設立	一
第二章 通才教育	一三
第三章 專門教育	四九
第四章 有關倫理的幾個問題	五八
第五章 更深入的政策基礎	一一七

第一章 高等教育爲誰設立

在邁向尋求一個高等教育的哲學途中，吾人不由得不至少同時雙管齊下。假如有人提起一個經常聽到的：「誰才該上大學？」此種問題，他會立刻發覺他所得到的答案須根據「大學」此一用字之意義爲何而定，尤其是，得依此一問題提出者與所提之大學有關課程方面之看法而定。但是，如果他所下的結論認爲當課程應受到優先考慮時，他將立即發現到，除非他已決定了課程之研究人選，否則便無法令人滿意地解決此一問題。

爲了對此一困難提出具體的解說，可採信總統的高等教育研究委員會之辯解，認爲美國青年中百分之四十九可以至少在大學求學中之頭二年獲得好處。該委員會究竟如何得到此一數字？如果說他們是基於一種人文主義者之衝動，爲何他們不將此百分比大大提高？比方

說，提高至百分之六十或甚至於百分之七十五？如果他們心目中特指的是傳統式四年制文學院之頭二年而言，爲何他們不將此數字之百分比更實際地降低，比方說，至百分之四十或甚至百分之二十五？儘管該委員會之判斷不過是一種對美國全民代表性的青年們的能力在不甚煩難的課程中所能圓滿達成之事務的臆測，但是，它到底不失爲一個可以達成一項對此二十世紀之美國的社會政治經濟之結構的有用而必需性之貢獻。

顯然地，我們的問題有二個方面，甚或三個方面：即學生之天才，課程之品質，與社會之需要是也。實際上，它們必須交錯而同一時間施行。幸而理論上，我們可以個別處理之，藉以避免複雜性與徹頭徹尾之混亂局面。因此，假如我們在討論此難題時，先從人的方面而非從文化的角度開始，似乎有點武斷，但是我們之所以如此做，是爲了澈底明白，同時我們也充分了解這些方面之不可分離性。

總之，提出誰說上大學這類的問題是不會有答案的。因爲想上大學的人好像都已在那裏了。但是，此一問題仍是存在的。許多人認爲今天在學大學生中，根本就有一部份是當初所不應讓其註冊入學的。更有些人認爲，有許多該上而未上的人。因此，要根據何種標準我們

才能決定大學入學之門開放的大小？由此，似有二種看法：其一，高等教育應限於少數人，而另一些人却認為高等教育應為多數人而設。

此上述二種概念中，認為高等教育應屬於少數者較具有歷史背景，事實上，它可以遠溯至希臘羅馬時代。當時之高等教育便是絕對性的階級教育，可以從「liberal」此一用字之遞變看出。此字之字根出自拉丁文之 *Liber*，意指自由。然而此一自由並非如今日一般所指的心靈方面，而是更趨於個人的政治與經濟地位而定的。是故，高等教育乃是相當於「自由人」之教育，以有別於奴隸或藝匠的教育。由於自由人不必為生計勞碌奔波，他可以致力公民及政治生活。不用說，在古代那種階級觀念牢固的社會中，此種自由人之數字是較低的。結果，自由或高等教育便成了少數人的特權了。

大學教育之成為特殊階級的上流社會之特權是由心物二元論之配合所加強的。與上流社會之操縱較低落之一羣的情形一樣，思想必定控制了肉體。這是一種自然的關係，因此，最

適合上層社會的教育乃是一種理性教育。而且，其具有較高智慧力發展之公民數字被局限於社會中較小的一部份，因為，如亞里斯多德所指出，知識教育涉及抽象理論及綜合方法，無疑的，這些都是最艱深的學問。此種分析由柏拉圖之共和國一書中可見其具體之化身。其中，國家之最終控制是由一小羣其知識潛力會由一個嚴格而精確的辯證法，從各種人民羣中所挑選出來的保護人所操縱。

因此，將高等教育局限於一小羣人並不光是歷史意外事件，而且有其存在之理由。事實上，其理由是如此使人相信，以致使之頗易於轉換成一個社會上與教育上的標準。果真如此，則高等教育不但目前可稱是少數人之特權，過去又何嘗不是，並且本來也就應該如此。

當然，此種看法可以找到歷代以至今日的有力支持。文藝復興時代在教育方面主要文獻上論及的是優秀人士，官庭人士，行政官員之訓練，並非中產階級之教育，更不必提一般平民了。即使在殖民地時代的美國，這種主義可在傑弗遜對他的故鄉維吉尼亞州之教育制度的種種建設發現其地位。這位偉大的民主黨人士曾計劃一個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的學生之循序漸進的遴選或淘汰制度，希望使各種天才可以較低層學校中被選出或如同垃圾堆中所挑出來

的。

當然，傑弗遜心目中的優秀份子乃是指頭腦優秀而非社會地位之優秀而言。有好一段時間，傑弗遜之理想一直成爲美國高等教育之理論，雖然，往往社經地位的確成爲其實現過程中之妨礙。即使在一個生活標準迅速提高的二十世紀今天，已經由於日漸增加的閒暇時間而使之較易於控制此種障礙，仍有許多領袖認爲吵嚷着想入大學的人數太過多了。當然，根據時日堆積之人文傳統而言，此話是不錯的。根據人文主義，閒暇之適當運用須加以訓練，自我抑制，以及俗氣之減少始能達成。由於人類都是富於感情而且自我放縱者多，僅有少數可以培養其合乎人文標準的。

一般像厄文巴畢特的人文學家深恐任何企圖提昇大衆之知識的合乎人道努力除了降低標準而外一無是處。另有些人採取同一看法者尙可包括詩人艾畧特，後來，在二次大戰後，當總統府高等教育委員會倡導至少二年大學教育應與初級及中等教育一般成爲美國青年必須接受之教育階段，賈南神父便曾以教育之通貨膨脹譏評此一報導。他認爲，爲一大堆平凡的學生負擔高等教育費用充其量僅能導致品質之降低。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假如賈南神父對經濟

之引申果真獲許，由於他贊成某些高等教育之金科玉律，此時對美國毫無保證的廣大學校之數字的擴充與循環必定受到限制。

二

總統府高等教育委員會之建議的口氣可以指出現在便是對高等教育應為大眾而設立之理論加以考慮之時候。此一理論只是在過去一百年來開始竄起的。其政治經濟基礎奠立於十八世紀末期，在該一世紀之後幾十年中，一方面是法國美國之革命，另一方面是工業革命均深刻改變了一直都在左右着高等教育之品質的社經基礎。頭二個革命宣稱全人類政治之自由。

第二個革命結果形成一個全部都在工作而全部亦都有空暇之經濟社會。此等變遷顯然將以往之上流的傳統置諸防衛立場，而將一個大學教育應局限於一小羣上等社會人士閒暇點綴的看法擊破。我們不能說它在十八世紀完結之前便已結束，但亦無法不承認其立場在十八世紀開始動搖，而貫穿了整個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生活水準之大大提高，部份由於西部邊域之原始富源，部份由於工業擴展，乃得完成此一制度。它藉由剷平了一直限制着廣大民衆，使之未

能實現其進入大學深造之理想的種種障礙，而加強了十八世紀之民主力量。

我們得承認一個越來越多申請進入大學之人數的歷史事實。問題是在於他們該不該獲准？我們如何解決此一問題？從前大學教育只可適合有閒階段之理論。可是，由於工業革命之結果，閒暇成爲了不單是某一階段的特權，多少地，已成爲了所有人的權利了。因此，許多人便認爲，既然沒有一個理由是使工作人員之閒暇時間得到更適當之排遣途徑，高等教育便應該予以普遍化。有一個基於現代經濟生活之龐大複雜性的請求是更具重要性的。在工業未發展之時代，可能對勞工領導工作方面之人才較不如今天之缺乏。如今，在經濟建設中，能上上下下通盤瞭解的各項才能是不可或缺的。就在工業領導人才與私人工作者之間，必定有許多不同程度的下駟之才，這些人需要不同程度之中等以後教育以保持有效而複雜的經濟方面的機械操作。因此高等教育在今天乃是一種必需品，當然不是對每一個人而言，但當然比從前之人數較提高了。

到目前，爲大衆爭取高等教育之論據係置之於各項經濟條件上的。它也可以基於各種政治條件。在貴族時代，大學教育乃係配合政治自由者的一種教育措施。那麼，依次類推，在

一個不止一些而許多人都是自由之社會中是否大家都應該接受高等教育呢？依照阿里斯多德之理論看法情況似乎可能，那便是因為他提出一種：「憲法應與其精神互相投合的制度相配合」的看法。果如所言，既然在各民主機構中，大家都絕對平等，那麼民主精神似應要求大學教育普及各階層了。

尤其是在今天的情形中，在一個公私生活均在前所未有的混亂局面之際，情形更是如此。公方面，在投票所選舉一切官員時，做人民的便應瞭解各項事務，自戰爭至和平，自白宮至州議會，自勞工至經理部門，自窮困至富裕等。半公半私方面，為了賺取一個生活之舒服而受到諸多複雜情景所困擾。一方面是因為商業與手工業已快速工藝化，不需技能之工作的百分比日漸降低。較高深之訓練，尤其在中等教育以後者，是必要的。同時，機器自動化亦將某些受過訓練的項目之工作日漸減少。因此，人們不但需要臨時尋求一個工作，而且要設法適應工作之變遷。再就私人本身而言，健康問題，尤其是精神衛生方面，需要一種前所未有的之瞭解的程度。對兒童之知識教育也變得十分技術化，自我規勉已不足適應了。最後由於我們的團體生活所增添之閒暇，使男男女女在對它的重大投資工作上遭遇到嚴重困難。

幸虧，不同性質之工作，可由下一代人中各項不同之人才所承擔。此類不同的性質倒過來如不能獲得，更需仰賴更為繁雜之工作者承擔，便須由於大量不同類的高中以後教育所承擔，如四年制大學教育，工藝專科，師範學院，二年制專科，社區大學，工業專校等等。對一般人，尤其是外國人而言，此一結果形成了全然的雜物，其中嚴肅的古老名稱，像學院，大學等不復有其共同的或明晰的定義。當然國立機關，州政府的高等學術機關之複雜制度的協調需要高等教育之政策的理論基礎之更寬廣的分析。

三

大多數人對支持高等教育之經濟與政治方面之爭論，明顯地牽涉到平庸學生之重要性。

這是一個較新穎的社會現象，就其對廣大人羣所放射出來的熱忱與能力，此現象並非一種全然的好現象。也許我們可以在我們本國的革命時期開始注意到他的興起。戰爭之所以發生的原則可鑒諸獨立宣言文中。在此宣言的原則下，有一條便提及「人類天生平等」此一句話。按照盧騷的看法，人之所以不得平等，可能便起因於教育之不平等故。由於相同的理由，不

平等之解毒藥必然是教育。荷瑞斯·曼曾說：「教育超乎其他各種人類起始之方法，乃是對人之各種情形之平衡物，社會機動之平衡」。不論平等主義之輸入爲何，人類想像力再未有比西部邊境對人之影響更加深刻的力量。連帶一個遼闊的阿巴拉其之後的自由之邦，事實上，人類幾乎變成他們所持爲原則的一種，也就是平等。有二位當過美國總統的人士對此美國生活起了共鳴。傑弗遜便是一位，他將平等之要義記入了獨立宣言，而安德魯傑克遜本人則是邊境民族之典型的平等主義者。

十九世紀初期，平等主義尙未對高等教育發生多大影響。大多數的大學仍是少數人認爲不過是爲了參予某項工作之必經途徑。可是爲了缺乏支持者的關係，大學呈肅滌狀。比方，在布朗之法蘭西斯·魏蘭便特別關心此一問題。可是隨着林肯對莫里爾法案之簽署，而有各種工農方面之課程之提供後，美國人民首次發覺到大學不光爲職業階級之需要而應爲一般人之需要而設立。康奈爾大學意謂爲一個任何人可以學習任何課程之機構，而明里蘇打州後來乃宣布世界上沒有庸俗膚淺得無法傳授之知識。最初是慢慢地，而逐漸增進其重要性，人們對此類新式教育也感習慣了。入學人數之增加所記載之比例，甚至連二十世紀中葉都未能比